

中共党史研究专题讲稿之一

党的民主革命战略思想 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训练部

一九八六年八月

党的民主革命战略思想 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冯建辉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训练部

一九八六年八月

目 录

一、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基本战略思想的提出·····	(1)
(一)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	(1)
(二) 列宁关于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 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初步认识·····	(3)
(三) 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策略方针的提出和 毛泽东关于民主革命的基本战略思想·····	(7)
二、工作重点转移，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创·····	(10)
(一) 工作重点从城市开始转向农村，党领导各 地武装起义·····	(11)
(二) 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	(21)
三、革命道路的历史曲折·····	(29)
(一) 大革命失败以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 方针政策·····	(30)
(二) 在极其有利的形势下，以李立三为代表 的党中央犯了“左”倾错误，革命受到 挫折·····	(33)
(三) 以“左”反“左”，王明等人上台以后 推行比李立三更“左”的主张，使革命陷 入绝境·····	(36)
四、遵义会议以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胜利	

实践和理论的发展.....	(40)
(一)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 党在思想上、理论上 日益成熟.....	(40)
(二) 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在抗日战争中的实 践与发展.....	(44)
(三) 农村包围城市格局的形成, 最后夺取全国 胜利.....	(48)
五、几点认识.....	(51)
(一) 要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	(52)
(二) 要坚持调查研究, 一切从实际出发.....	(53)
(三) 要有正常的党内生活和健全的集体领导.....	(54)
(四) 要有谦虚谨慎的作风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55)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斗争中，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认真研究中国的国情，逐渐认识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基本战略思想，并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集中全党集体智慧，系统的提出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系统的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走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理论。在长期革命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特征的毛泽东思想体系。中国人民，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沿着农村包围城市的光辉道路，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是我们党的一大创造。是我国民主革命最重要的历史经验，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和研究我们党提出民主革命战略思想和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基本战略思想的提出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情

近代中国自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的基本情况是：

第一，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主宰了中国的政治，垄断了中国的经

济命脉。由于中国是大国，再加上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使得中国在形式上仍保持着独立地位。帝国主义各自在中国寻找代理人，与封建势力互相勾结，造成中国在政治上，外无民族独立，内无民主制度，军阀割据，长期不统一。

第二，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使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解体。国际资本主义经济牢牢地控制了中国的城市，而广大农村仍然是封建的小生产经济占优势。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同流合污，造成中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工业仅占百分之十，而农业占百分之九十，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地位。

第三，作为上述政治经济状况的集中反映，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势力、官僚资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构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随着社会的发展，主要矛盾和各种社会矛盾发生着错综复杂的变化。

第四，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他们占有极少的耕地，受着地主阶级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工人阶级数量少质量高，除具有一般工人阶级的优点外，还有革命性最强，最集中，与农民有着天然联系等特殊优点；中国的资产阶级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不同，分为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买办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民族资产阶级则既有剥削工人一面，又有受帝国主义压迫排挤一面。

学习和研究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首先要了解近代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是最基本的国情。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①“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

^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627页。

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①

（二）列宁关于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初步认识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提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民主革命的若干光辉思想。一九一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列宁在东方各民族共产主义组织第二次全俄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要求东方各族无产阶级，“依靠一般共产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努力寻找解决“农民是主要群众”，“斗争任务不是反对资本而是反对中世纪的残余”这一独特任务的“独特形式”^②。一九二〇年六月，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所作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提出封建的家长制和家长农民占优势的国家，进行革命应当注意的六个问题。基本思想是：（1）无产阶级要积极参加反帝的民族解放运动；（2）要反对封建主义；（3）要搞革命的农民运动；（4）不要把民族解放运动“染上共产主义的色彩”，即不要超越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中进一步指出：（1）殖民地革命第一步任务是民族解放，其前途不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而是为无产阶级开辟解放道路；（2）民族解放运动要无产阶级领导；（3）要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后来对中

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431页。

② 《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68页。

国和东方各国革命起了重要指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中国共产党之初，就开始运用这一科学的认识工具观察中国的社会问题。建党前后，中国共产党人曾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进行过有名的“三次大论战”，即“问题与主义”的斗争，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三次大论战”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怎样认识中国国情的重要问题。地主资产阶级文人梁启超、张东荪等人反对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重要理由是：社会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他们认为：一、中国无剥削不需要革命，只要改良就行了。张东荪说：

“中国向例地主与佃农多是平分收入”，“农民对于所受地主的痛苦，没有十分深刻的印象。即使废了地主，农人生活虽有变化然未必甚大。”（《现在与将来》）。二、中国没劳动阶级，不需要搞什么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梁启超说：“吾以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

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言论受到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批驳，《新青年》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篇。一是陈独秀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一日），一是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一九二一年五月一日）。陈独秀指出：“中国官僚、武人与绅士、土豪互相结托的资本主义，比各国纯粹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还要厉害”。有剥削压迫，必然要革命。李达还把“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做为一种制度区别开来。他指出，“中国现时社会实况与欧美略有不同”，但“只有产业发达的先后不同，和发达的程度不同，而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本原则，却无有不同”。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开始用马克思主义

做为认识工具观察中国社会，初步提出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认为中国是“比各国纯粹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还要厉害”的社会，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原则完全适用于中国，这是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上，迈出可喜的第一步；另一方面尚处幼稚状态，对中国的国情缺乏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封建经济在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所占的重要地位缺乏了解，还不能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做出正确的判断，大多数人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

党成立以后，立即投入实际斗争。一方面集中主要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从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一九二三年二月，全国各地的罢工斗争有一百多次，其中著名的有香港海员大罢工、安源煤矿大罢工、京汉路总同盟大罢工等，中国工人运动出现第一次高潮。另一方面也有些人开始从事农民运动。如彭湃于一九二二年九月在海陆丰成立了第一个规模较大的赤山约农会。在实际斗争中，一部分共产党人“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况”（《先驱》发刊词，一九二二年一月），对中国国情的认识取得不少新的成果。

首先，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看法很快有了改变。一九二二年七月召开的党的“二大”，指出中国是帝国主义支配下的“半殖民地”、“半独立国家”。一九二六年九月召开的党的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提出军阀、买办、官僚“都是中国的半封建势力”，宣布“打倒国外的敌人（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敌人（半封建势力）”。此时，虽然还没有明确使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已经有了基本正确的认识。

第二，对中国农民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党在创立时就提出农民问题，到党的“二大”和“三大”，对农民的重要地位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党的“四大”，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把农民问题与

无产阶级领导权联系起来。“四大”以后，党的一些领导人如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邓中夏、毛泽东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农民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写了《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集中了我党研究农民问题的成果，系统阐发了“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业又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民运动须与国民革命、工人运动结合，须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等重要思想，同时对农民组成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第三，开始把资产阶级分为两个部分。党的“一大”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视为一样，同是革命对象。党的“二大”、“三大”初步认识到中国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有区别，他们遭帝国主义压迫而不能自由发展经济，有民族独立要求。但尚未认识到中国还有一部分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资产阶级。党的“四大”，开始看到中国资产阶级有两个部分。一是“士商买办阶级”，“完全是帝国主义的工具”；一是“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现在还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所以还不可能参加民族革命运动”。也就是说，看到了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但还不够明确。到一九二六年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才明确地把中国资产阶级区分为两个部分——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并科学地分析了他们各自代表的生产关系和对待革命的不同态度。

中国共产党在逐渐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逐步提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策略方针。到第一次大革命时期，由毛泽东总结全党经验，形成我党关于民主革命的基本战略思想。

（三）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策略方针的提出和毛泽东 关于民主革命的基本战略思想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纲领”规定在中国“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党的“一大”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适合于中国国情，要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这件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至于怎样实现这一目标？采用什么方法？当前的革命任务是什么？这些问题在当时都还没有提出。

一九二二年一月，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列宁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民主革命理论得到比较广泛深入的传播。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接受了列宁的这一光辉思想。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问题，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低纲领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建立民主共和国。党的“二大”，认识到半殖民地的中国走向社会主义必须经过民主革命阶段，第一次制定了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正确指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从此，中国民主革命才有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

党的“二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民主革命纲领而奋斗的过程中，对民主革命的策略思想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党总结第一次工人运动由高潮转向失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工人阶级人少力单，光凭工人阶级单独干不行，要寻找更多的同盟军，需要建立革命的联合战线。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

会，确定与国民党实行合作的方针，并且认识到“农民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也很难成功。”国共合作方针的确立具有重大意义，使中国革命很快出现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高潮，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党的队伍迅速扩大。党的“三大”的不足之处在于，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者之间的联系与区别缺乏正确的认识，认为国民党居于革命的领袖地位，以至后来发展为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的党的“四大”，纠正了“三大”的错误看法，第一次正式提出无产阶级关于民主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会议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会议还就工农联盟的重要意义和如何开展农民运动问题指出：“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党的“四大”以后，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周恩来、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发表了大量文章，对民主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和方针进行了发挥、探索和新的概括。如瞿秋白关于无产阶级要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思想，邓中夏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取得政权的思想，周恩来关于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论述等，都使党关于民主革命的理论思想进一步深化。特别是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文章，集中这一时期党内的探索成果，比较系统地提出民主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和方针政策，初步形成关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理论。

这一理论的要点是：第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在大

的战略步骤上应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第二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第二，当前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第三，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其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企图“实现民族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是完全行不通的”；第四，关于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思想以及在对农民各个阶层进行科学分析基础上制定的策略方针，提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的策略路线；第五，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两个部分，以及处理和资产阶级复杂关系的策略思想和关于统一战线的基本理论、方针、政策。

我们党在第一次大革命中形成的关于民主革命的战略、策略思想和方针政策，正确地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推动了革命斗争的迅速发展，从而使我们取得了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虽然由于资产阶级的叛变，大革命终于遭到失败，但大革命时期形成的关于民主革命的战略策略方针，为大革命失败以后我们党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形成，提供了一个好的思想基础，同时也“准备好了红军的种子，准备好了红军的领导者即共产党，又准备好了参加过一次革命的民众。”^①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创，是我们党关于民主革命战略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备，并且使这一战略思想找到了最好的体现形式。

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82页。

二、工作重点转移，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创

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七月，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汪精卫的武汉政府相继叛变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失。国内阶级关系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民族资产阶级附合了新军阀的统治，上层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只有工人、农民和贫苦的小资产阶级还在继续坚持斗争。一九二七年八月蒋汪合流后“继续北伐”张作霖。翌年六月，张作霖率部从华北撤回东北，国民党军队占领北京，宣布“北伐胜利”。十二月张学良亦接受蒋介石的指挥。至此，蒋介石建立了形式上统一中国的政权。

应当怎样认识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这些新情况、新变化呢？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建立“是资产阶级得了胜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因此，中国无产阶级只能以“国民会议”为中心进行合法斗争，等到将来再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这一观点，直到三十年代初，托陈取消派还在大肆鼓吹。有一些犯左倾错误的同志则认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说明革命性质变了。提出混淆革命性质的“不断革命”论。他们还把群众对反动派的愤恨情绪看做革命形势继续高涨，盲目的搞城市武装起义。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大革命失败以后的艰苦斗争中，注意调查研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进行了科学的分析：

第一、“现在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依然是城市买办阶级和乡

村豪绅阶级的统治。”^①国民党政权政治上是新军阀的联合统治，经济上是江浙财团为基础的封建买办阶级的代表。对外关系上是依靠英美，勾结日本。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二、“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②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了一支比历史上任何军阀规模都庞大的军队，建立了全国性的特务组织，疯狂屠杀和镇压革命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革命的主观力量大为削弱。

第三、虽然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的统治，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反而日渐激化。“全国工农平民以至资产阶级，……没有得到丝毫政治上经济上的解放”^③；“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必然造成“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④这就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造成革命必然发展的条件。

（一）工作重点从城市开始转向农村，党领导各地武装起义

（1）党中央决定并指导各地武装起义。

在大革命面临失败的危机时刻，中共中央于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改组，十三日发表对时局宣言。接着制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决定发动南昌起义；准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

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召开“八七会议”。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就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两个重大问题进行了讨论，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光辉思想。会议确定了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0页。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9页。

④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1页。

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号召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到农村去，“领导并参加农民暴动”。会后选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三人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代表们分赴各地，传达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组织武装起义，实行土地革命。

八七会议以后的党中央，虽然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第二年四月曾一度犯有“左”倾错误，但总的说来是担负起了领导全党进行武装斗争的重担。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派毛泽东、张太雷、叶挺、贺龙、周逸群等一大批干部到各地领导武装起义。如一九二八年一月九日《中央关于成立湘西北特委给郭亮同志信》：“中央决定在湘西北组织特委，发动群众，造成暴动割据的局面，并派贺云卿（即贺龙）、周逸群等同志返湘工作，特委的书记，由兄担任”。

第二，及时对各地武装起义进行指导。如南昌起义南下广东主力失败后，中央指示“叶贺所剩余的势力应走‘到农民中去’帮助当地农民摧毁豪绅的政权，……武装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①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致两湖省委信》提出“在乡村中大发展游击战争”，“领导农民割据”。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央致广东省委信》指出：“须知农民暴动的路线是从下至上、从乡村到城市，乡村不肃清，单以占据城市是站不住的”。等等。中央的这许多指示，虽然从总的指导思想上仍然是“城市中心”论，但对武装起义的发动，游击战争的开展，摸索新的形势下城乡关系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第三，支持和推广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和红四军的某些好经验。如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中央给德润二兄并转前敌

^①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1927年10月24日）。

诸同志的信》；同年十一月六日《中央巡视员贺昌给龚楚兄转玉璩润之及四军军委信》；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五日《中央给云卿并前委诸同志的指示信》；七月三十日《中央给四川省委的指示信》；八月十日《中央致鄂东北特委指示信》等文件，都对“朱毛红军”的游击战术、军队建设经验做了肯定，并指示各地应好好学习。

（2）南昌起义揭开土地革命战争新时期的序幕。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国民革命军三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成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民主革命政权——革命委员会，并陆续制定和公布了《中央委员宣言》、《土地革命政纲》等文献，宣布“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①八月三日至五日，起义军分批撤离南昌，转战千里南下广东，打算以广东东江地区为根据地，依靠海口取得外援，“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②、“建立工农政权”^③，进一步夺取广州。九月底十月初，起义军到达广东东部三河坝、汤坑地区，与广东军阀发生激战，因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主力遭失败。起义军前敌委员会在流沙召开最后决策会议。中央派张太雷同志前来参加。根据中央指示，南昌起义领导人分批撤离。起义军一部约一千二百人，在董朗、颜昌颐率领下到达海陆丰，与当地农民武装结合，为开辟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做出贡献。起义军另一部在朱德、陈毅率领下，开始上山进行游击战争。一九二八年初转战湘南，与当地党组织一起发动湘南起义，开展工农武装割据。四月上井冈山，与毛泽东

① 《兼代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告官兵书》。

② 李立三：《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

③ 《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信——向潮汕进军的问题》（1927年9月）。